

再论张翰的回归

胡小优

(西华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摘要】对于张翰,一般的认识多停留在对其归隐选择的向往。实际上,张翰的归隐并不是简单的选择,而是在一系列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的结果。其中涉及到魏晋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张氏家族政治遭遇与仕途前景、家族文学与文化的特异性、吴郡地理因素等诸多因素。张翰的回归选择,虽充溢着浓重的历史感和时代的悲剧意味,但其在回归后追寻存在价值的积极意义以及情感的丰富性,实则更值得后世关注。

【关键词】张翰回归;多重因素;家族文学与文化;积极意义与丰富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2)04-0033-05

一

(一) 张翰风流后人慕

张翰的回归总与秋风、莼羹、鲈鱼脍这三个意象紧密联系。可以说,这三个意象不仅早已组成西晋名士张翰的标识,更在相当程度上业已形成了固定的文化心理与文学思维对接。历代诗词对张翰的回归行为更是吟咏不断。作品有唐代白居易的《端居咏怀》、赵嘏的《长安秋望》、宋代徐铉的《送魏舍人仲甫为蕲州判官》、辛弃疾的词《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苏东坡的《三贤赞》、元代仇远的《秋怀和子野》以及清代学者张大纯的《过季鹰墓感赋》等等。这些作品表达的多是对能够回归故里的的羡慕和向往,又抑或是对张翰隐士人格的高度赞赏。在诗人们看来,张翰的回归更多代表的是惬意的生活选择与淡泊的人格追求。在众多的士人中,李白对于张翰的理解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二) 李白与张翰

张翰无疑是对李白产生过影响的魏晋人物之一,这一点却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关注。李白曾在多首诗篇中运用到关于张翰其人、其事的典故。如在《秋下荆门》中写到:“霜落荆门江树空,布帆无恙挂秋风。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1]P1023}初次出蜀处于青年时期的李白意气风发,张翰式的回归选择被认为是其政治上的蜷缩与对现实人生的避退。在诗中用秋风、鲈鱼的典故来表明自己与张翰所作的不同的人生选择。而在李白的《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中却写到:“张翰黄花句,风流五百年……去国难为别,思归各未旋。空馀贾生泪,相顾共凄然。”^{[1]P822}在诗中不仅把自己比作怀才不遇的贾生,流露出不得志之后潜藏内心的凄怆思归之情,由此转而开始企羡张翰式的潇洒回归。在《行路难》其三,称其为“达生”,并欣赏其嗜酒

任诞的生活方式与轻视名利的人生态度。李白在《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中还写到:“紫禁九重,碧山万里。有才无命,甘于后时。刘表不用祢衡,暂来江夏;贺循喜逢张翰,且乐船中。”^{[1]P1253}张翰遇贺循是后人称颂不已的知音的相遇与心灵的高度契合,其中尽传魏晋风神;而祢衡不遇于刘表,是有才之士才华不被赏识不得施展的委屈与悲哀。这两个典故的运用中也透露出李白内心知音难觅与怀才不遇的两大隐痛。而在李白的《南奔抒怀》中,这种不遇的隐痛与思归的情感在前后句的对比中更加明显与强烈:“侍笔黄金台,传觞青玉案。不因秋风起,自有思归叹。”^{[1]P141}因此,由于李白有着功成身退与追求适意的人生态度,当理想难以实现时他时时心慕如张翰般的潇洒隐退,同时对自身充满深深的感喟。虽然如此,李白对于张翰的理解,还是不能摆脱一般认识上的窠臼。

(三) 诗酒风流与生命体验

除了思归情切之外,张翰对待酒与名利的关系上所表现出的任诞与旷达也为人所熟知。《世说新语·任诞》:“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任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2]P738}而在《行路难》其三,李白就写到:“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1]P119}在经历了现实与理想的打击与失意后,张翰的重饮酒之乐轻世俗名利的观念也对李白产生一定的影响。对于魏晋士人与酒的关系,有研究者讲到:“魏晋时代酒文化的社会层面由庙堂转向士林,其功能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增浓了个人化和审美化的色彩。时值社会动荡,礼制崩坏,老庄之学借玄谈的形态复兴,敏感的文人在频繁的战火煎熬和改朝换代的夹缝中深切地感受到生存

收稿日期:2012-09-02

作者简介:胡小优(1988—),女,四川平昌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的危机,便在生命无常处体味着生命的恒在价值。作为这种生命体味的酵素的,便是带有刺激感、麻醉感和迷狂感的特殊饮料——酒。他们打破了“酒以成礼”的传统成规,借杯中物以自陶自适,在任性放诞的士风中体验着内在生命的苍凉与畅达,使生命进入了一种诗情的奇幻境界。”^[1]魏晋士人所饮下的酒,其中更多充满了人生的苦涩与无奈,是人在精神、情感上的痛苦不得消解的沉溺之物;而唐人整体以积极昂扬的气质著称,酒更多是一时的解愁之物,酒容易幻化成诗人豪气而诗意盎然却绝非有如魏晋士人般深刻的生命体验。

二

(一)亡国丧父与江东士人入洛的前景

张翰式回归多为后世诗人词人遥想畅望,而对张翰的辞官回归的原因研究者们并未过多探究,事实上,张翰回归的选择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张翰约生于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年,卒于晋元帝大兴二年319年,他的一生经历了西晋建立吴国灭亡、西晋的战乱不已以及东晋的偏安江左这三个复杂混乱的特殊历史阶段。张翰父亲张俨在吴国历任显位,在宝鼎元年266年正月,孙皓排遣其出使西晋吊晋文帝丧,而就在返回东吴时却不幸病死途中,张俨死后不久西晋破吴,从此,吴国再无如三国孙吴时期独立的政权与显赫的政治地位。张翰的幼年就已经处在丧父的家庭现实与邦国灭亡的政治历史背景这双重生活巨变之中。

另一方面,张翰作为吴地士族子弟未来的政治前途与命运,正如研究者分析的那样:“西晋灭吴吴地掌握在晋朝手上,江东士族经历了切肤的亡国剧痛,北尊南卑的统治阶级心理基础与社会现实,使得南方士人的政治前景也相应发生逆转。西晋定都洛阳,其政治和社会基础必然是北方中原士族,这也就决定了如南方江东这些士族在地缘政治上处于劣势,参与西晋政权的机会甚少。”^[4]因此,《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的贺循与张翰的相遇共同入洛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当时某些特定的政治历史事实。可能正如章义和先生指出的:“吴亡之后,尽管西晋王朝对江东大族得到经济基础未予触动,但在政治上非常冷淡和歧视,这便引起了太康初年江东地区的一系列武装反叛。晋武帝及时地调整了方略,采纳了华谭的建议,先后招陆机、陆云、陆喜、顾荣、张翰、贺循等人入洛任官。”^[5]西晋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平叛乱,采取怀柔政策即将吴中望族子弟

召至京师授予官职,做出重视江东人才的姿态,导致一时间投奔洛阳的江东官宦子弟络绎不绝。吴郡张氏作为江东大族四姓之一,张翰的入洛更在情理之中。尽管此期与孙吴初亡情形不同,然而北方大族所构成的现实政权结构和因亡国之余而遭到的轻视、排斥,使江东大族子弟难有大的政治作为。

(二)江东士人生命惨例与畏惧心理

魏晋政权更迭,司马氏夺得政权后,并未获得长治久安。北方战争频乃,先是八王之乱,再是五胡乱华,士人在战乱中不死则亡少有保全,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西晋灭亡。八王之乱使得张华、石崇、潘岳、欧阳建、陆机等大批名士葬身其中,西晋也是整个魏晋南北朝士人被害的一个较为集中重要的时期。《世说新语·识鉴》中写到:“翰谓同郡顾荣曰:‘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吾本山林间人,无望于时久矣。’张翰确实及时看透了当时时势的纷乱黑暗与士人求名逐利难保性命的本质。他在归隐的人生选择之中,更多的不是后世所认为的潇洒与惬意,而是由‘无望于时久矣’中流露出的因时代而产生的抑郁悲愤与无奈。

此外,对于幸运逃脱政治灾难后的张翰,也必然会在思想和情感上发生较大的转变。出于政治灾难的惊悸与对仕途风险的清醒认识,必定会让其对政治保持疏离和畏惧。尤其是同是入洛的江东世族子弟陆机所发出的“华亭鹤唳,岂可复闻!”的生命悲叹与沉痛悔悟,千载之下犹让人唏嘘不已,更何况对当时士人的影响。作为幸存者的张翰,由入洛的世族子弟的惨祸,不仅由于物伤其类强烈感受到生命无常,更会在心理上留下浓重的阴影。后世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张翰生存的特殊背景,就其生存的社会历史时代与家族背景而言,这一人物是以“悲剧”作为人生底座。

(三)家族文化特点与政治遭遇

张翰的回归选择,特殊的时代背景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吴郡张氏作为世家大族,其特殊的家族文化特点与家族士人的政治遭遇,也影响着张翰仕隐出处的选择与政治态度。

在《世说新语·赏誉》中有:“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这是魏晋之间吴地人对当地大姓的家族文化风貌的概括。这说明吴郡张氏是具有尚文与擅文特点的文化大族。孙吴时期吴郡张氏好尚清议与尊奉儒家道德节操,但张氏在文化的适应性与包容性很强。如吴亡之后,中原玄学之风流入江南,由于老庄之学在江南缺乏基础,接受起来比较困难。如陆氏与顾氏儒学根基深厚,此时

这两姓仍恪守传统儒学。但张氏家学中的经学儒学积淀则较浅。因此,没有儒家文化传统以及黄老思想对于思维上的强大束缚,张氏家族相对于其他江东世族,对玄学接受、理解与领会上更胜一筹,吴郡张氏家族在思想文化上倾向于老庄思想,家族成员所受的影响也相对较深。玄学是以老庄思想作为基础,而老庄思想本身有着全身避祸、淡泊名利以及和政治疏离的思维特征。因此,这恰恰潜在地赋予了张翰在乱世中全身避祸的机敏与智慧。《世说新语·识鉴》中的记载体现了这一点:“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12]P393-394}

西晋吴郡张氏的文化地位比较显著,但在政治上尤其西晋时期却显得比较沉寂。这可能与其家族在孙吴时期的政治遭际有关。张氏家族在孙吴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主要有张允及其子张温、张祉、张白、张敦、张纯父子以及张俨等人。其中最有名、政治地位最突出者当属张温。张温担任过孙吴的选曹尚书和太子太傅等职务,为孙权所亲重。但由于张温好清议且桀骜不驯,深为孙权所忌。在孙吴张氏门风的变迁中,暨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暨艳由张温引荐终为尚书,但他好清议喜臧否人物,由于大肆弹射百官揭发他人过失,成为众矢之的,最终不得不自杀。孙权也将张温免职斥还本郡,其弟张白、张祗等也被禁止做官。张纯曾担任过太子孙和的辅议都尉,孙和为孙权第三子,后孙权欲以第四子孙霸取代孙和,江东大族人物皆有反对,张纯也坚决拥护孙和,向孙权进言极谏,引起孙权强烈不满,孙权将其先幽禁后弃市。张温、张纯等张氏家族中的优秀成员在孙吴政权的遭遇势必给家族留下心理阴影,使得其家族其他成员不敢轻易涉足政治,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家族中可能形成了谨慎、保守而非躁进的入仕态度。

三

(一)真实强烈的思乡之情

张翰的回归,不仅有前面所提到的原因,更有内心真实强烈的思乡之情作为情感基础。他的骚体诗《思吴江歌》:“秋风起兮佳景时,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安未归,恨难得兮仰天悲”^{[6]P738}在诗歌体裁上,张翰选择了骚体的形式来表达思乡之情。这不仅符合西晋社会喜欢运用四言和骚体进行诗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更是对屈原用骚体抒发思乡念国之情的写作传统的某种继承。就诗歌本身

而言,《思吴江歌》中以秋风、鲈脍等为情感的触媒,表达思乡羁旅之情。吴地佳景美食与相距千里的隔绝现实,反衬出的是诗人无法返归故乡的凄凉。三千里遥远的地域阻隔的现实加之于心理的沉重使人不禁悲恨相续仰天泣叹。正如马冀所言:“乡情势对故乡美好记忆的集中体现,是一种追求精神慰藉和心理平衡的普遍心理状态。隔绝机制又使得乡情被不断强化,是一种恋母恋故、复归自己群体的心理追求。”^[7]张翰最初入洛也是儒家思想中倡导积极出仕实现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的行为,但在个人无法实现社会化与政治化的人生价值时,故乡成为精神家园与审美空间。

可以说,《思吴江歌》属于魏晋思乡诗的范畴,可以说是在继承古代诗歌思归主题传统的基础上,由西晋时代和张翰个人思乡情感激荡下盛开的一朵奇葩。

(二)吴地区域地理特点

南北之间地理环境的差异也是思归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相对于南方,北方的秋季呈现出的是寒冷、萧瑟与荒凉的物候特征,这与江南的秋水碧于天、四时景色堪赏迥然有别。由来自客体地理的差异,最易引发主体个人生理的不适应与引发异地客居之人的主体感知,从而触动心理上的悲思产生故乡思归的情绪。而《思吴江歌》的写作缘由,也正是当张翰入洛后面对北方秋景的肃杀萧条,遥想着家乡吴郡的秋景却应是另一番佳景时情不自抑的产物。吴地作为江南地区的典型代表,虽历史上长期远离政治权利中心,但经济富庶人文荟萃,加之山明水秀的区域景色特点与小桥流水人家式的平静安逸生活,自古是文人归隐的理想之地。而在西晋东吴士人普遍的潜意识里,吴地曾作为晋前三国鼎立之一的孙吴政权的政治中心,加之又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经济上的雄厚实力。因此,吴人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域优越心理和较为强烈的区域意识的。

张翰等入洛的南人对北地在诸多方面如政治、地理、饮食生活、文化等都不能从内心真正的适应,更不用说取得情感上的认同。这源于归属感的缺失造成情感心理上的疏离。哀帝元年,桓温请求把永嘉乱中流亡江南者尽数北迁,以实河南。由此孙绰的《谏移都洛阳疏》写到:“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这种贬北褒南的意识,反映出的正是南方优美的地理环境对于长期生活其中的人形成的归属感和强大的惰性,而人对此环境的巨大依赖性也可见一

斑。

(三) 引领家族文化与情感表现

晋室南渡成立东晋后,张翰好友顾荣与贺循都再次入仕。而张翰却没再入仕,而究其根本原因却是归吴之后各自的人生追求与渐成型的人格模式的不同。张翰是以老庄思想为主的玄学人格模式,而顾荣、贺循等则是典型的以儒为主“玄儒结合,柔顺文明”的人格模式。而“东晋政权偏安一隅,士人生活在相对安定和平静的社会中,柳细花柔的南方山水,儒玄合流的文化氛围,君主与士族共理国事的政治格局,为玄学人格的完成,提供一个较好的社会氛围。”^[8]

张翰在大约为归隐之后的作品《杂诗三首》其中一写到:“暮春和气应,白日照园林。青条若总翠,黄华如散金。嘉卉亮有观,顾此难久耽。延颈无良途,顿足托幽深。荣与壮俱去,贱与老相寻。欢乐不照颜,惨怆发讴吟。讴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9]P737由诗可见,张翰与陶渊明一样是有儒家用世之心,内心也有着仕隐贫富的痛苦与挣扎。诗中诗人的嗟老卑贫之情即使是对着眼前明媚的春景也难以排遣,诗人也只能转而遥向古人寻求心灵的慰藉。

对于张翰归吴后是否定位自我人生价值的问题,他的《杂诗三首》其三就显得特别值得注意。此诗虽一般都认为是托物言志,但诗歌的主旨仍令人费解。诗中写到:“忽有一飞鸟,五色杂英华。一鸣众鸟至,再鸣众鸟罗。长鸣摇羽翼,百鸟互相和。”^[10]P738“飞鸟”与“百鸟”形成的无疑是一种主导与追随的关系,六朝时期,高门世族多为学术文化阵地。可以说,能否在文化上占据优势,是世族与寒门庶族的根本区别。在决定门第的众多因素中,相

对于经济、权势、军功等,文化无疑是首要的、关键的因素。而张氏家族在文化上从来不甘落后,张翰作为西晋家族文化的代表和玄学思想文化的传播者,与诗中的“飞鸟”形象特点较为暗合。玄学对痛苦的心灵有着慰藉作用,利于维持心境的平和。西晋中后期,业已成为名士们自觉的生活方式,张翰入洛更受玄风熏染。回到东吴,因循此习惯不仅顺理成章,更有意识地延续。传承玄风玄学。此诗可能暗寓着张翰在对政治的厌倦后,转而企图在文化学术上找寻自身价值,成为类似起着开门户作用的人物。事实上,张氏家族的玄学文化自东晋起日臻佳境,并成为区别于其他世族的重要特征。“吴郡张氏自东晋起便在玄学界崭露头角,至刘宋末年其玄学达到了与侨姓士族分庭抗礼的水平,玄学的独特造诣使得吴郡张氏成为屈指可数的文化大族”^[9]。

此外,西晋江东文学成就较为显著,以张翰为代表的士人,虽作品不多,却显示出写作上的自觉和情感抒写上的真挚与丰富。《思吴江歌》抒发强烈的思想之情;《杂诗三首》其一展示的是归隐后情感的真实与无奈,杂诗其二是对自我人格的隐喻,而杂诗其三借用意象隐晦地传递自我价值追求。如研究者指出:“吴国覆灭后,则经历了丧亲亡国之痛的江东世族,在政治命运发生历史性转折的同时,感情世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动与激荡,于是文学成为了这些世族新锐后进之士感情寄托的主要载体,才华宣泄的主要渠道,此又是西晋时代江东本土文学成就尤著的重要契机所在”^[10]。

综上所述,对张翰回归的原因和归隐后的价值追求的探讨,是深度理解人物情感和文学文化意义的关键所在。这一人物身上所体现出的悲剧性、丰富性与积极意义,都值得人去细致体味和深入关注。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3]杨义.李杜诗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78.
- [4]王彦红.六朝吴郡张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D].曲阜师大,2009.
- [5]章义和.地域集团与南朝政治[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2:119.
- [6]逯钦立辑校.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7]马冀.月是故乡明——论中国古代乡情诗[J].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6.
- [8]李建中,高华平.玄学与魏晋社会[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 [9]吴正岚.六朝门阀制度对江东士族儒学的影响[J].思想史研究,2004,6.
- [10]胡阿祥.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40.

On the Regression of Zhang Han

HU Xiao-you

(College of Arts, Xihu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9)

Abstract:For Zhang Han, general awareness stays in his yearning for hermitage. In fact, Zhang Han's hermitage is not a simple choice, but in the results under the joint effect of a series of factors, which relate to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Zhang's family political encounter and career prospects, family literary and cultural specificity, Wu Jun geographic factors and so on. Zhang Han's regression selection was filled with a strong sense of history and the tragedy of the times, but the pursuit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existence value and richness of emotion after his hermitage were in fact more worthy of the later generations' attention.

Key words: Zhang Han's Hermitage; Multiple Factors; Family Literature and Culture; Positive Significance and Richness;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13页)

Abstract:Negative adverb is a kind of word which is relatively complex and controversy in the Chinese word. The study on the pre-Qin Chinese negative adverbs has been a hot research topic in Chinese history and has never stopped.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negative adverb "Fu" of Mandarin and the special books and word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data in specific times for exploring the syntax regular development rheological, and hoping to be able to help clarify such as negative adverbs "no", "fu".

Key words: Grammatical Function; Semantic Function; Pragmatic Func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